

## 第四章 大陸的經濟政策特性

馬克斯並不反對經濟活動，甚至視經濟活動為人類活動主軸。他認為人類需求的滿足是經由工作所得以交換物質，但由於人的欲望是永無止境，所以人永遠無法脫離工作而生存。基於此，馬克斯將工作視為人達到自我實現的某種最基本形態，是故，經濟活動自然對人類活動產生正面的影響。然而，他卻更憂慮於資本家與資本主義形成後所造成的負面深遠衝擊，如壓榨、普羅化、疏離、社會階級的形成、權力產生所導致的特權與衝突局面等。而資本家與資本主義乃是自由經濟市場機制的產物，所以為使人能繼續從事經濟活動，以達自我實現的目的，並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唯由透過政治指令式的手段，才能控制經濟活動的形態，並實現其規劃性的經濟目標。在此種大層面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大陸的經濟活動自然是被規劃為社會主義的路線。

國內研究者郭慶汾(民 83)認為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其經濟活動形態的產生已不再是基築於勞動力與商品價值交換的形態：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生產資料是單一的公有制，每一個人都是生產資料的主人，這使商品經濟存在的基本條件 -- 不同所有者之間為交換而生產 -- 不再存在。那時的勞動時間就不必採取商品經濟的價值形態，勞動時間的調節規律雖仍然起作用，但卻是作為調節各種勞動在社會按比例地分配和計量個人消費品的尺度而表現。」(頁 6-7)

上述引文中顯示出，奉行馬克斯主義的國家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已

異於一般形態，其中最大特色是企圖將社會推向烏托邦式的共產境界，勞動力已不再被商品化了。這種目的的達成的起點必須藉助政治的途徑，即革命。再者，這種政治控制力將一直左右共產國家的經濟活動。在此種情境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已不再是「自由」與「自然」，而是有顯著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干預，所以也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如在中國大陸固然亦會產生類似與自由市場中「景氣循環」的情形（魏利祝，民 85）。但是，這種結果的形成卻非自然的經濟循環波動，而是由於政治因素使然。例如 1958 年的「大躍進」大幅提高當年的工業產值達 56.9%，但在三年後的 1961 年卻造成嚴重的衰退。鄧小平在 1992 年春天發表「南巡」講話後，造成中國大陸經濟情形急劇的改變。在其強人統治的威權下，大陸中央政府的政策自然極力的配合，如投資快速膨脹。但是這種政策性強力干預以自由為本質的經濟活動，自然會造成一些嚴重的負面影響，如物價高漲、金融秩序的失衡。這些負面的衝擊迫使大陸中央不得不在同年的下半年進行宏觀的調整，以恢復金融秩序的平衡。上述例證顯示出大陸的經濟政策深受政治意識形態的牽制，所以魏利祝（民 85）評論道：

「在西方適用的經濟波動理論，由於中國大陸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並無法完全解釋。因此，提出能解釋中國大陸經濟循環波動的理論，實為一重要課題。在中國大陸往往政策的頒佈，便會引發經濟的衰退或高速發展，因而『政治周期』學派所認定，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波動主要是由政治變動所造成，而中央政府反覆不定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其所形成的『政治周期』，對中國大陸經濟波動具有高度解釋力。」（頁 190）

這段話明顯的指出共產主義國家的特殊政治形態，以致形成與自由世界不同的經濟情境。其中更有一點重大的含義，即是在此種政治體制下，政治力量超乎一切，它是塑造不同社會結構的主要條件，因而經濟便一直受政治的宰制與指揮，此種經濟含有極為明顯的政治性，所以展現出「計劃」的特質。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談話中，便直接指出經濟活動是必須依計劃運行：

「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份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應遵循的原則。」(轉引自郭慶汾，民83：頁11)

實際上，這種「計劃性」亦解決馬克斯主義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活動間的衝突性(郭慶汾，民83)，因為奉行此種主義的國家如中共，必須解決共產體制下經濟活動力衰退的既存事實，然而又不能違反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所以在此種情境下便出現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名詞可局部化解「姓資」或是「姓社」的爭議。